

A Visualized Analysis of Cultural Teach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 Bibliometric Study Based on CiteSpace 国际汉语教育中文化教学研究的可视化分析——基于 CiteSpace 的计量研究

| Sukma Tajuddin^{1*} | Sukma² | Asmulyati Nahnu³ |

¹*Colla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China*

²*Faculty of Humanities,
Hasanuddin University,
Makassar, Indonesia*

³*Faculty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ate University
of Makassar, Makassar,
Indonesia*

*sukmamengtian@hunnu.edu
.cn
sukma@unhas.ac.id
asmulyati.nahnu@unm.ac.i
d*

ABSTRACT

Driven by the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strategy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ultural instructio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crucial componen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Based on 487 CSSCI and core journal articles from the CNKI database published between 2016 and 2025, this study employs CiteSpace 6.3.R1 to analyze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evolutionary paths of this fiel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keyword co-occurrence, clustering, burst detection, and author–institution collabor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research focus in cultural teaching has shifted from “traditional cultural dissemination” to “intercultural integration,” with key hotspots centering on tea culture,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professional degree programs. Collaborative networks show a growing trend toward clustering, and several keywords exhibit strong burst intensity and long duration, indicating sustained academic attention in this field. This study helps clarify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cultural instruction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future topic development, paradigm construction, and pedagogical innovation.

KEYWORDS

Bibliometric analysis; CiteSpace; cultural teaching;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Research Hotspots

引言

“文化教学”作为国际汉语教育中的核心议题，自 21 世纪初以来逐步受到学界重视。最初，文化内容在语言教学中多作为附属元素出现，用以辅助词汇或语法的理解 (Anthony J. Liddicoat, 2013) 然而，随着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发展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文化在语言学习中的地位 (Baraldi, 2012; Byram, 2021) (Juwono, 2024)。近年来，伴随“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推进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文化教学逐渐从边缘走向核心，成为衡量国际汉语教育质量与效果的重要标准之一 (Jung &

Wang, 2020) (孙有中, 2016; 段鹏, 2022) (Lin, 2025) (段辉煌, 2020) (Zhang & Yao, 2021)。

现有研究表明, 文化教学不仅承担传递语言背景知识的任务, 更在促进学习者文化认知、价值观建构及身份认同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Kramersch 1993 (Kramersch, 1993) (陈申, 2020; 李泉, 孙莹, 2023)。在国家政策层面, 2021 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国际中文教育标准体系建设的意见》(丁安琪, 2024) 明确强调“文化教学”应贯穿语言教育全过程, 推动汉语课堂走向“语言+文化”的融合模式。这些变化促使研究者不断拓展文化教学的研究视野 (Sirui, 2018) (Xu & Hu, 2024), 探讨其在教材编写、教学设计、课堂互动与学习评价中的具体实施路径。

尽管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日益丰富, 但现有文献多聚焦教学案例解析与理论初步探讨, 缺乏对文化教学研究在宏观结构、发展演进、热点议题及协作网络等方面的系统性梳理。这一现象反映出当前学界在议题拓展、理论体系构建及综合研究视角方面的不足,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化教学理论的深入发展与教学实践的优化提升。为深化此前研究中尚未全面覆盖的知识结构分析, 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6.3.R1 可视化分析工具, 基于 2016-2025 年 CNKI 收录的高质量 CSSCI 及核心期刊文献, 从文献计量学视角系统揭示国际汉语教育文化教学的知识图谱结构、研究热点与演进趋势, 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数据参考与方法支撑。

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筛选策略

为确保数据来源的学术权威性与代表性, 本文选取中国知网 (CNKI) 作为核心文献检索平台。CNKI 作为我国最具影响力和覆盖面广泛的学术数据库之一, 汇集了大量关于语言教育与文化教学领域的高质量研究成果。鉴于研究目标聚焦于“国际汉语教育”与“文化教学”相关议题, 本文限定检索时间范围为 2016 年 1 月 1 日 - 2025 年 6 月 30 日, 并优化检索策略以确保文献与研究主题的相关性。

在检索策略方面, 本文采用“国际汉语教育 OR 中文化教学 (或) 文化教学”主题词组合, 通过布尔逻辑“OR”与“AND”进行多轮精准检索, 并辅以严格的筛选标准, 以确保文献的学术质量与研究相关性。为提升样本文献的代表性与引用价值, 数据范围被限定于 CSSCI 来源期刊与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之内, 排除硕博士论文、会议论文及其他非正式出版物, 仅保留正式发表的期刊论文。

在初步筛查阶段, 研究通过设定高级检索条件, 剔除主题不符、内容重复度高或研究视角明显偏离的文献, 最终确定 487 篇符合主题、内容充实、具备较强学术贡献度的核心文献。这一文献样本为后续的可视化分析与研究热点识别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与方法论基础。

2.2 数据可视化处理方法

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6.3.R1 (64-bit Basic 版本) 可视化分析软件, 对所遴选的文献样本开展系统性的知识图谱挖掘与结构分析 (陈悦、陈超美, 2015)。CiteSpace 是一款基于 Java 平台开发的文献计量分析工具, 具备强大的图谱构建、关键词突现检测与研究前沿识别功能, 已被广泛应用于信息科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多个领域的科学计量研究。

在数据处理流程方面，研究团队首先将来自中国知网的 487 篇目标文献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并命名为“download_1.txt”，再通过软件导入功能完成数据加载与格式规范化处理。为确保分析结果的时效性与层次性，设置时间切片为 1 年（Time Slicing=1），选取节点类型包括作者合作网络、机构分布图谱及关键词共现矩阵，构建多维度、层次化的知识结构可视化图谱。

在图谱构建完成后，研究围绕年度研究趋势变化、核心作者与机构的协作关系、关键词聚类特征及研究主题演进路径等维度展开深入分析，旨在通过可视化手段揭示国际汉语教育文化教学研究的知识基础、发展脉络与热点动态，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科学支撑与数据依据。

理论基础

1. 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

Byram (Byram, 2021) 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提出五大核心维度，即 savoir（文化知识）、savoir-être（开放态度）、savoir-faire（交际技能）、savoir-apprendre（文化学习能力）与 savoir-transférer（知识应用能力）。该理论认为，文化教学不应局限于传统文化事实的传播，而应聚焦培养学习者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有效互动能力例如，通过茶文化教学不仅传递茶艺知识（savoir），更需引导学习者以开放态度看待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异（savoir-être），并掌握跨文化交际中的礼仪表达（savoir-faire）。在本研究语境下，该理论为解释研究重心从“传统文化传播”转向“跨文化整合”提供了理论依据，明确国际汉语教育中文化教学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非单向的文化灌输。

2. 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理论

Kramersch (Kramersch, 1993) 的理论指出，“文化”并非语言教学的辅助内容，而是语言习得的有机组成部分。她强调，语言学习本质上是文化意义建构的过程。学习者在掌握“茶”这一词汇时，需同步理解其背后蕴含的“待客礼仪”“中庸哲学”等文化内涵；在学习“春节”相关语篇时，需结合社会习俗理解句式表达的情感倾向。该理论为“文化教学从边缘走向核心”的论点提供了支撑，解释了为何文化教学成为衡量国际汉语教育质量的关键指标，同时为分析文化内容与教学设计的融合提供了理论框架。

研究结果及探讨

3.1 年度趋势分析

学术论文的年度发表数量是衡量特定研究领域发展活跃度与研究热度的重要指标，具有显著的趋势预警与学科生态观察价值。基于 CNKI 2016-2025 年相关领域的发文数据，本研究采用定量统计与动态趋势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国际汉语教育文化教学研究的学术产出进行系统梳理，并绘制年度发文趋势图（见图 1），以呈现该领域近十年的发展波动与演进轨迹。

1. 总体趋势：呈现递减态势，阶段性特征显著

从整体趋势来看，2016—2024 年间该领域年发文量持续下降，学术关注度逐步减弱。2016 年发文量为 77 篇，到 2024 年锐减至 9 篇，累计降幅达 88.3%，呈现明显的衰退态势。结合发文变化特征，可将该过程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初步下滑期（2016—2018 年）

该阶段呈现由高位起步、逐步下行的特征。尽管 2017 年发文量短暂回升至 90 篇，但随即在 2018 年降至 42 篇，年均降幅约 24.5%。研究主题尚处于理论探索与问题梳理阶段，缺乏稳定的研究路径与共识性议题，导致研究热度波动较大。

第二阶段：波动调整期（2019—2023 年）

此阶段发文数量趋于稳定，2019 年回升至 51 篇，之后四年间基本维持在 50 篇上下（2020 年 50 篇，2021 年 47 篇，2022 年 49 篇，2023 年为 49 篇），呈现出平台期特征。研究内容聚焦于具体议题的延展与教学实务层面的探讨，显示出研究逐步走向深化，但整体缺乏创新突破与理论引领，发展动力相对不足。

第三阶段：加速萎缩期（2024 年）

2024 年发文数量骤降至 9 篇，较前一年减少 81.6%，呈现出断崖式下滑趋势。该现象可能受到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包括研究议题趋于饱和、理论支撑不足、外部政策支持减弱以及学术重心转移等。从数量变化上看，2024 年成为整个观测周期内降幅最大的一年，标志着该领域或已步入研究产出的低谷期。

2. 2025 年数据的特殊性与观察价值

数据显示，2025 年发文量维持在 9 篇，与 2024 年持平，缺乏回升迹象。尽管考虑到部分当年成果尚未完全收录的客观限制，但连续两年维持在个位数的发文水平，已初步显现出该领域研究热度持续低迷的态势。此一趋势呼唤学界重新审视文化教学在国际汉语教育中的理论创新空间、学科贡献价值及其在整体语言教育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总体而言，2016—2024 年间该研究领域呈现出连续性、不可逆的收缩态势，特别自 2023 年后加速下滑，反映出研究范式创新乏力、学术资源分配紧缩、研究重心转移等深层次问题。未来研究应结合文献内容特征、方法论演变、政策导向变化等多重因素，深入剖析其衰退背后的内在逻辑，并探索该领域融合发展或转型升级的潜在路径，以期推动其重塑研究生态与学术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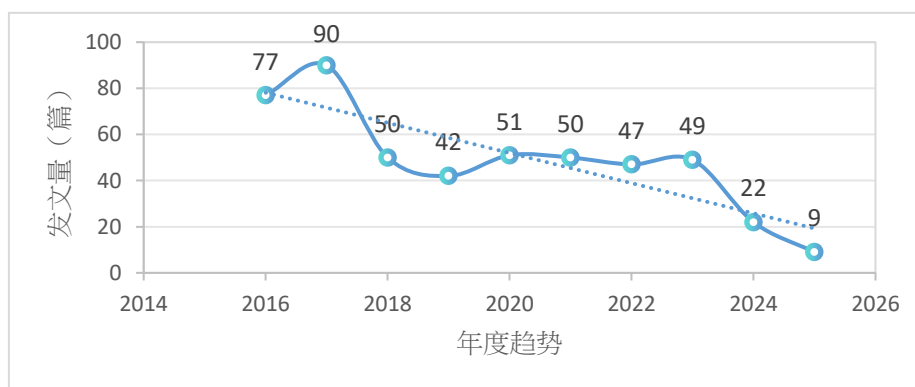


图 1. 国际汉语教育中文化教学年度发文趋势（数据来源：CNKI）

3.2 作者分布情况

在 CiteSpace 软件操作过程中，节点类型设置为“作者”（Author），阈值（Threshold）设定为 1，即作者发文数量达到 2 篇及以上者将被纳入可视化分析范围。根据生成的图谱结果可见，2016—2023 年间，国际汉语教育中文化教学领域的核心作者发文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统计数据来看，吴应辉于 2016 年共发表 11 篇相关论文，展现出其在该领域的奠基性与引领性地位。紧随其后的是崔希亮，其在 2018 年发表 5 篇论文，亦在学术界形成较大影响。近年来，新生代学者逐步崭露头角，其中王晓丹于 2023 年共发表 4 篇，成为该研究方向中的活跃代表。此外，吴勇毅、李宇明、宋晖、王睿昕、李宝贵、李娟、刘玉屏等学者亦分别在不同年度内贡献了 2 至 3 篇论文，持续推动文化教学相关议题的深入探讨。

从时间维度考察，作者发文分布整体趋于均衡，既包含早期持续贡献的学者，也呈现出近年来新兴研究力量的积极参与，反映出该领域学术关注度的稳定延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部分学者发表数量较为可观，但整体来看，作者之间的合作网络尚显松散，缺乏紧密的团队结构与稳定的协作机制。为进一步提升研究质量与创新力，未来应鼓励跨机构、跨地区乃至跨国界的学术协作，构建多元联动的研究共同体，以推动文化教学研究在理论深度与实践广度上的融合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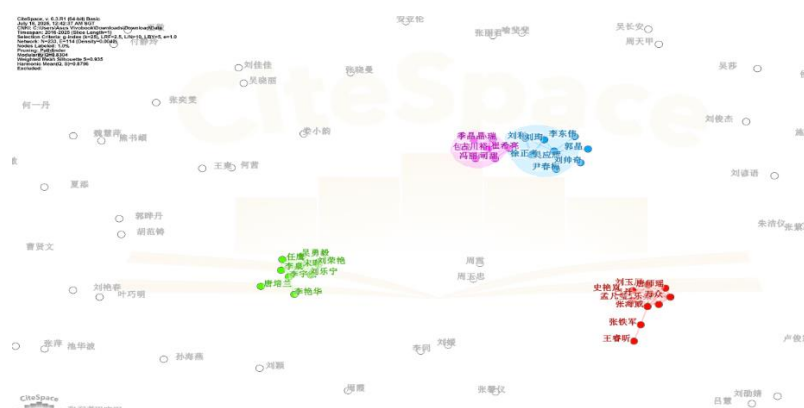


图 2.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3.3 研究机构分布情况

在 CiteSpace 软件中将节点类型设定为“机构”（Institution），可生成国际汉语教育中文化教学领域的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图谱。通过对图谱数据的进一步提取与整合，本文梳理出主要研究机构的发文分布情况（见表 1）。表中所列为在 2016—2025 年间发文数量不低于 4 篇的单位，反映出该领域研究力量的区域集中性与机构层级结构的初步形成。

从发文总量来看，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以 15 篇的成果位居首位，中心性指数达 0.02，表明其在合作网络中的辐射力与连接度较强，具备一定的核心地位。其次，北京语言大学与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分别以 12 篇与 10 篇位列其后，

均为国家重点建设高校的语言教育研究机构，在文化教学相关研究中长期保持着较高的投入与产出。

处于第二梯队的包括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9 篇）、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均为 7 篇），其中心性介于 0.01 至 0.03 之间，显示出在跨机构协作与知识传播方面仍具较高的影响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与“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两家单位同时入选，体现出该校在语言政策研究与文化传播实践领域的双重建树。

在第三梯队中，出现了如新疆师范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等地方性与综合类高校的代表性机构，尽管其发文数量相对较低（4 - 5 篇），但在区域文化背景下的教学适应性与跨文化传播研究方面展现出鲜明特色，成为推动研究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综上，当前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文化教学研究仍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等教育资源密集地区的优势高校与研究中心。然而，随着区域高校在本土文化语境下的理论建构与教学实践不断深化，研究力量正呈现出由“中心集聚”向“多点辐射”的拓展态势，未来或将形成更具开放性与协同性的研究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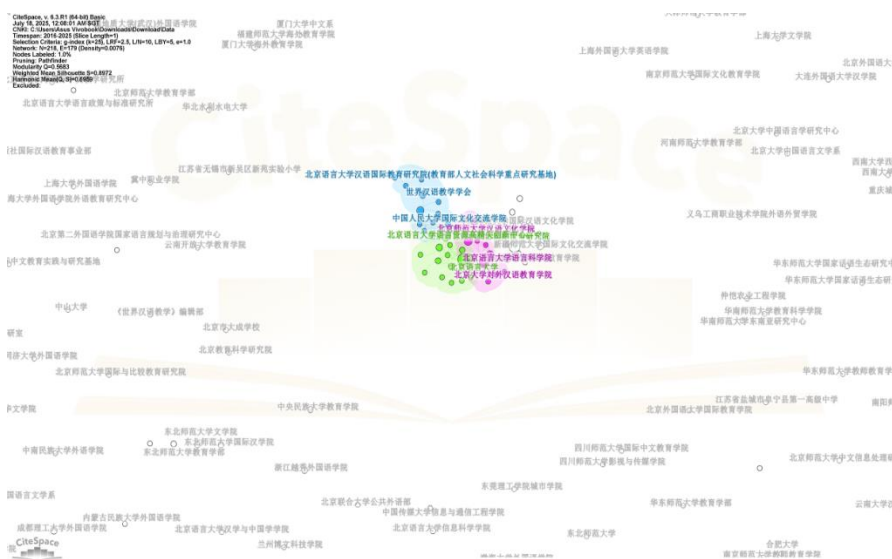


图 3. 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表 1. 机构分布表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机构
1	15	0.02	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2	12	0.01	北京语言大学
3	10	0.01	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4	9	0.02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
5	7	0.03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6	7	0.01	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
7	6	0.01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8	5	0.00	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9	4	0.00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10	4	0.00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话语生态研究中心

3.4 热点呈现

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学视角，借助 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工具，对 2016-2025 年国际汉语教育文化教学相关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数据详见表 2）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度挖掘，揭示当前研究领域多维度、层次化的知识结构与议题聚合特征。依据关键词中心性（Centrality ≥ 0.03 ）与出现频次（Frequency ≥ 5 ）的双重判据，结合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Byram, 2021）与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理论（Kramsch, 1993），识别出以下核心研究集群与前沿趋势：

一、核心研究集群特征

（1）传统文化传播网络

以“茶文化”（频次 39，中心性 0.11）为枢纽节点，聚合“文化教学”（28 次，中心性 0.02）、“孔子学院”（9 次，中心性 0.03）等高频概念，构成稳定的传统文化教育主题网络（平均路径长度 1.8）。从 Byram 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视角分析，该集群反映传统文化教学从“事实传播”向“能力培养”的转型：早期研究多聚焦茶文化知识的传递（如茶艺流程、茶类分类），对应 *savoir*（文化知识）维度；近年研究则转向“如何以茶文化为媒介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例如，通过模拟“中式茶会”场景，引导学习者掌握跨文化交际中的礼仪表达（*savoir-faire*），并以开放态度理解中西方“饮食社交”的差异（*savoir-être*）。

值得关注的是，“文化自信”（5 次，中心性 0.01）虽频次较低，但与主节点的边权重达 0.38，表明文化认同议题近年逐步受到关注。研究多围绕“如何通过传统文化教学增强学习者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展开，这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相呼应，同时契合 Byram 理论中“文化身份建构”的内涵。而“文化差异”（5 次，中心性 0.00）处于边缘状态，缺乏连接性，反映跨文化比较视角尚未成为主流研究焦点。现有研究多强调“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却较少结合“文化差异”探讨教学适配策略，理论建构与经验研究仍需强化。

（2）语言教育创新网络

以“对外汉语”（9 次，中心性 0.03）为核心，借助“跨文化”（6 次，中心性 0.03）、“教学方法”（5 次，中心性 0.01）等中介节点，形成跨语境语言教育议题的互动网络。“专业学位”（6 次，中心性 0.03）节点虽频次不高，但中心性突出，凸显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在学位制度变革中的关键地位。研究多围绕“国际汉语教育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的文化课程设置”展开，例如如何将“跨文化交际理论”纳入必修课，以提升未来教师的 *savoir-apprendre*（文化学习引导能力），这与 Byram 理论对“教师能力培养”的要求高度契合。

结合 Kramersch 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理论, 该集群印证 “文化教学” 与 “语言教学” 的深度融合: 研究中提及的 “教学方法” (如任务型教学、情境教学) 均强调将文化内容融入语言技能训练 例如, 在 “购物” 主题的语言教学中, 同步融入 “讨价还价” 的文化习俗; 在 “节日” 主题的语篇教学中, 结合社会文化背景解析句式情感倾向。这种融合模式打破 “文化教学独立于语言教学” 的传统认知, 符合 Kramersch “文化是语言习得有机组成部分” 的核心观点。

需特别说明的是, 表 2 中 “大学英语” (20 次, 中心性 0.07)、“英语教学” (11 次, 中心性 0.02) 等关键词, 虽看似与 “国际汉语教育” 主题无关, 但从研究逻辑看, 其功能为 “方法参照” — 现有研究多以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整合经验 (如 “通过英语文学教学传递西方文化”) 为参照, 探索汉语教学中传统文化的融入路径。例如, 借鉴英语教学中的 “文化浸润式教学法”, 设计汉语课堂中的 “传统文化情境任务”, 这一参照思路为国际汉语教育文化教学提供了方法借鉴, 故保留相关数据并纳入分析框架。

二、新兴研究前沿分析

(1) 政策导向研究群

“一带一路” (3 次, 中心性 0.00) 与 “对策” (4 次, 中心性 0.05) 的共现强度达 0.25, 构成 “宏观政策 - 微观实践” 联动结构, 凸显政策导向型研究的集群特征。此类研究主要聚焦语言教育国际传播的制度保障、文化渗透及国家话语体系建构等维度 例如, 探讨 “一带一路” 倡议下东南亚孔子学院的文化教学内容调整: 针对东南亚学习者的文化背景, 将 “丝绸之路文化” “中医药文化” 纳入教学重点, 同时简化与当地文化差异较大的内容 (如传统婚俗), 这一实践既适配政策需求, 又符合 Byram 理论中 *savoir-transférer* (知识应用能力) 的要求, 即 “根据语境灵活调整文化知识的传递方式”。

(2) 教育技术革新领域

以 “创新” (4 次, 中心性 0.00)、“高校英语” (4 次, 中心性 0.00) 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类节点构成松散集群, 平均边权重仅 0.12, 中心性均为 0, 反映教育信息化与数字化教学仍处于探索积累阶段, 尚未形成系统性研究框架。从理论应用层面看, 现有研究多聚焦 “技术工具的简单应用”, 如开发在线传统文化课程、利用 PPT 展示文化图片, 却较少结合 Byram 理论探讨技术对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的支撑作用 例如, 尚未利用虚拟现实 (VR) 技术模拟跨文化交际场景, 帮助学习者提升 *savoir-faire* (交际技能); 也未通过人工智能 (AI) 实现文化教学的个性化反馈, 助力学习者弥补 *savoir* (文化知识) 的短板。

表 2 中 “高校英语” 关键词的存在, 同样体现 “技术应用参照” 的逻辑: 现有研究多以高校英语教学中的技术整合经验 (如 “AI 口语测评系统” “VR 跨文化交际模拟”) 为参照, 探索国际汉语教育文化教学的技术赋能路径 例如, 借鉴高校英语的 “AI 文化知识测评模块”, 设计汉语学习者的 “茶文化知识测评系统”, 实现文化知识掌握程度的精准评估。尽管当前技术应用仍显初级, 但该领域已显现理论空白与实践拓展空间, 未来需加强技术与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深度融合。

三、研究热点演化路径分析

通过关键词时区视图的动态追踪，结合年度发文趋势与理论发展脉络，可将研究主题的演进过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文化引领阶段（2016 - 2018 年）

以“茶文化”“孔子学院”为代表关键词，关注点集中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路径与内容表达。此阶段对应“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初期，研究以文化事实传播为主导。例如，探讨孔子学院如何通过“文化讲座”“非遗展览”传递传统文化知识，核心目标是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理论支撑以“文化传播理论”为主，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Byram, 2021）的应用较少。

标准建构阶段（2019 - 2021 年）

“专业学位”“人才培养”（5 次，中心性 0.03）等关键词频繁出现，体现学界对教育质量体系与师资标准建设的高度关注。研究多围绕“国际汉语教育专业学位的文化课程设置”“文化教学师资的能力标准”展开。例如，明确文化教学师资需具备“跨文化交际理论素养”“传统文化解读能力”等核心能力，这与 Byram 理论中“教师需掌握跨文化交际五大维度”的要求相契合。此阶段反映文化教学从“内容导向”向“质量导向”的转型，理论应用开始从“文化传播”转向“跨文化交际”。

融合发展阶段（2022 年至今）

“对策”“跨文化”等新兴词项活跃度持续上升，呈现跨学科融合、国际视域拓展与理论实务并重的综合趋势。研究一方面聚焦“跨文化教学中的问题对策”例如，针对“文化差异导致的学习障碍”，提出“文化适配教学策略”；另一方面探索“跨学科融合路径”例如，结合教育学、社会学理论分析文化教学的实施机制。此阶段理论应用更为多元，Byram 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与 Kramsch 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理论成为核心支撑，推动研究向“理论 - 实践融合”方向深化。

综上，国际汉语教育文化教学研究已从传统文化传播逐步向融合化、多元化方向演化。未来可通过三方面深化推进：一是强化跨文化理论支撑，尤其加强“文化差异”“跨文化比较”视角的研究；二是拓展技术融合路径，探索 AI、VR 等技术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中的应用；三是提升区域间研究协作，构建“中心 - 区域”联动的研究网络。当前领域演进趋势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革命”及“新文科”建设战略高度契合，反映该领域在新时代教育发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战略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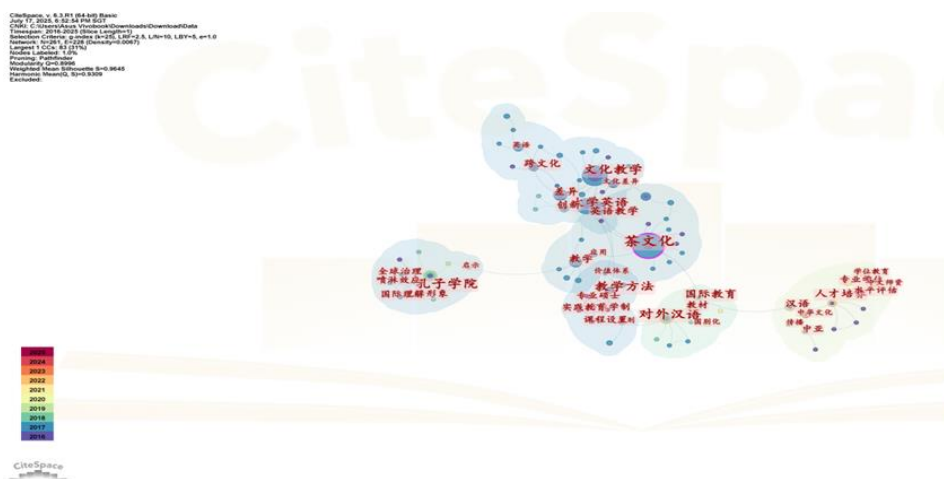


图 4. 关键词共现图谱

表 2. 关键词频次及中心值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序号	频次	中心性	关键词
1	39	0.11	茶文化	11	5	0.03	人才培养
2	28	0.02	文化教学	12	5	0.01	教学方法
3	20	0.07	大学英语	13	5	0.00	文化差异
4	11	0.02	英语教学	14	5	0.01	文化自信
5	9	0.03	孔子学院	15	4	0.00	创新
6	9	0.03	对外汉语	16	4	0.05	对策
7	9	0.03	差异	17	4	0.01	汉语
8	7	0.02	教学	18	4	0.01	英语
9	6	0.03	专业学位	19	4	0.00	高校英语
10	6	0.03	跨文化	20	3	0.00	一带一路

3.5 关键词聚类分析

基于 CiteSpace 聚类算法生成的知识图谱，结合表 2 关键词数据，本研究识别出 6 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题聚类（Cluster ID #0-#5），涵盖文化教学、语言教学方法、师资培养、水平评估及国际传播等关键议题维度。结合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Byram, 2021）与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理论（Kramsch, 1993），分析各聚类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向如下：

1. Cluster #0（规模 = 25，平均年份 = 2016）：传统文化与对外汉语融合研究
聚类核心标签为“文化教学”（LLR 值 18.96, $p=1.0E-4$ ），辅以“中华传统文化”（10.31, $p=0.005$ ）、“对外汉语”（9.22, $p=0.001$ ），反映 2016 年前后学

界对“传统文化如何融入对外汉语教学”的关注。LSI 结果显示，“跨文化”“传统”“对外汉语”等关键词高度聚合，凸显跨文化教育话语体系的建构趋势。

从理论视角看，该聚类的研究多遵循 Kramersch 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理论：例如，探讨如何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融入文化内涵 讲解“福”字时，同步传递“倒贴福”的民俗文化；分析“饺子”相关语篇时，结合春节习俗解读其象征意义。这种“语言 - 文化同步教学”模式，打破传统“先语言后文化”的割裂状态，符合 Kramersch “文化是语言习得有机组成部分”的核心观点。

2. Cluster #1 (规模 = 17, 平均年份 = 2016)：文化教学应用策略研究

以“教学”(LLR 值 11.14, $p=0.001$)、“茶文化”(7.13, $p=0.01$)为核心标签，关键词“应用”“策略内涵”“对外汉语”频繁共现，表明学界日益关注文化教学中的策略设计与实践导向。研究多围绕“传统文化教学的具体实施策略”展开，例如“任务型茶文化教学策略”设计“筹备中式茶会”任务，引导学习者在完成语言任务(如邀请、点餐)的同时，掌握茶文化知识与跨文化交际技能。

从 Byram 理论维度分析，该聚类的策略设计主要聚焦 savoir-faire (交际技能)与 savoir-apprendre (文化学习能力)：任务中设置“跨文化冲突模拟”环节(如“外国客人拒绝喝热茶”)，引导学习者运用交际技能化解矛盾；同时通过“任务反思”，培养学习者自主总结文化学习规律的能力，体现“策略设计 - 能力培养”的联动逻辑。

3. Cluster #2 (规模 = 13, 平均年份 = 2017)：文化教学水平评估研究

核心标签为“水平评估”(LLR 值 9.07, $p=0.005$)、“专业学位”(9.07, $p=0.005$)，集中反映语言教育评价机制在课程体系与学术标准构建中的核心地位。研究多围绕“文化教学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展开，例如，将“跨文化交际能力”细化为“文化知识掌握度”“交际礼仪熟练度”“文化适应能力”等二级指标，对应 Byram 理论的五大维度。

此外，“中亚”“文化适应”(LLR 值 4.49, $p=0.05$)的出现，提示研究逐步延伸至区域文化适应性评估 针对中亚学习者，设计“丝绸之路文化适应度”评估模块，考察学习者对“中亚 - 中国文化交融点”的理解，这一实践既体现区域研究特色，又拓展了 Byram 理论中“文化适应”的研究范畴。

4. Cluster #3 (规模 = 10, 平均年份 = 2017)：孔子学院文化传播研究

以“孔子学院”(LLR 值 14.12, $p=0.001$)为核心标签，辅以“师资培养”(4.6, $p=0.05$)、“一带一路”(关联表 2 关键词)，研究多围绕“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功能优化”展开，例如，探讨如何通过“本土化师资培养”提升文化教学的适配性 培训孔子学院本土教师掌握“中华文化解读方法”与“跨文化教学技能”，以更好地满足当地学习者需求。

从理论应用看，该聚类的研究契合 Byram 理论中 savoir-transférer (知识应用能力)的要求：强调孔子学院教师需根据当地文化背景调整文化教学内容 —— 在东南亚孔子学院，将“茶文化”与当地“咖啡文化”对比教学；在欧洲孔子学院，侧重“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共通点”讲解，体现“本土化 - 国际化”的平衡逻辑。

5. Cluster #4 (规模 = 9, 平均年份 = 2020) : 文化教学方法创新研究
聚焦“教学方法”(LLR 值 11.43, $p=0.001$), 关键词“实践教学”“课程设置”“专业硕士”频繁出现, 表明研究关注点从宏观理论转向教学实践优化与教师能力提升。研究多围绕“文化教学方法的实证探索”展开, 例如, 通过课堂实验对比“情境教学法”与“案例教学法”在茶文化教学中的效果, 发现情境教学法更能提升学习者的 savoir-être (开放态度) 与 savoir-faire (交际技能)。

该聚类的研究体现“理论 - 实践融合”的趋势: 一方面以 Kramersch 理论为指导, 确保教学方法设计符合“语言 - 文化融合”原则; 另一方面通过实证研究验证方法的有效性, 为文化教学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推动课程改革的系统化与实证化发展。

6. Cluster #5 (规模 = 9, 平均年份 = 2018) : 对外汉语与国际教育融合研究
核心标签为“对外汉语”(LLR 值 19.06, $p=1.0E-4$)、“国际教育”(9.3, $p=0.005$), 关键词“国别化教学设计”“翻转课堂”构成核心话语结构, 代表 2018 年后研究议题的国际化转型特征。研究多围绕“国际教育背景下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国别化设计”展开, 例如, 针对非洲学习者, 设计“中华文化与非洲本土文化交融”的教学内容; 利用“翻转课堂”模式, 引导学习者课前自主学习文化知识, 课上聚焦跨文化交际实践。

从理论视角看, 该聚类的研究拓展了 Kramersch 理论的应用场景: 将“语言 - 文化融合”从“课堂教学”延伸至“国际教育体系”, 强调文化教学需适配不同国家的教育制度、文化背景与学习需求, 体现“国际化 - 本土化”并行的多元趋势, 同时为 Byram 理论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境化培养”提供了实践案例。

上述聚类不仅清晰勾勒文化教学在国际汉语教育语境下的知识图谱轮廓, 还揭示研究范式从“文化 - 语言融合”向“技术 - 教学协同”“政策 - 实践联动”的转向特征, 呈现多维拓展、跨界融合的理论演进态势。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聚类间的桥接节点(如“跨文化”“对策”), 深化知识网络的耦合机制探析, 推动理论体系的系统化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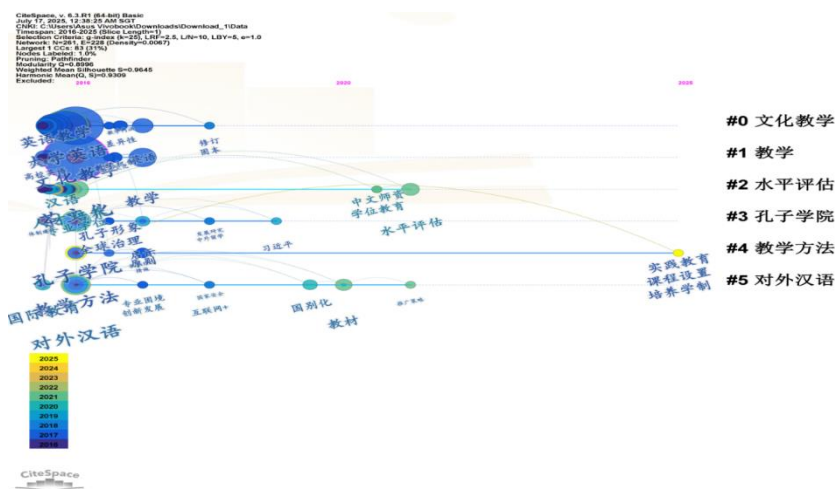


图 5. 高关键词演进时间图谱

表 3. LSI 与 LLR 算法关键词聚类结果表

聚类 ID	规模	轮廓值	平均年份	LSI 标签	LLR 标签
#0	25	0	2016	(14.5) 中西; (2.81) 西方; (10.68) 英语	文化教学 (18.96, 1.0E-4); 大学英语 (12.44, 0.001); 中西茶文化 (10.31, 0.005); 文化差异 (6.12, 0.05); 创新 (6.12, 0.05)
#1	17	0	2016	(9.84) 应用; (2.81) 西方; (3.81) 策略内涵; (6.67) 英语	教学 (11.14, 0.001); 茶文化 (7.13, 0.01); 文化教学 (5.51, 0.05); 应用 (5.5, 0.05); 英语文化教学 (5.5, 0.05)
#2	13	0	2017	(7.61) 水平评估;	水平评估 (9.07, 0.005); 专业学位 (9.07, 0.005); 人才培养 (9.07, 0.005); 茶文化 (4.64, 0.05); 中亚 (4.49, 0.05)
#3	10	0	2017	(9.84) 孔子学院; (3.81) 师资培养;	孔子学院 (14.12, 0.001); 汉语国际教育 (6.36, 0.05); 师资培养 (4.6, 0.05); 习近平 (4.6, 0.05); 命运共同体 (4.6, 0.05)
#4	9	0	2020	(7.61) 教学方法; (2.22) 英语	教学方法 (11.43, 0.001); 实践教育 (5.62, 0.05); 专业硕士 (5.62, 0.05); 课程设置 (5.62, 0.05); 培养学制 (5.62, 0.05)

#5	9	0	2018	(11.42) 对 外汉语;	对外汉语 (19.06, 1.0E-4); 国际教育 (9.3, 0.005); 翻转 课堂 (4.6, 0.05); 教材 (4.6, 0.05); 国别化 (4.6, 0.05)
----	---	---	------	-------------------	--

3.6 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突现指特定时间段内部分关键词使用频率显著增长，反映领域研究关注点的变化轨迹。基于 CiteSpace 生成的突现视图，结合表 2 关键词数据与核心理论，2016-2025 年国际汉语教育文化教学研究在关键词层面呈现明显的阶段性演进特征，整体可划分为三个研究发展阶段：

1. 第一阶段（2016-2017 年）：文化理念探索期

关键词突现集中于“文化教学”（突现强度 5.04，2016-2017）、“跨文化”（1.02，2016-2017）、“对外汉语”（1.89，2016-2017）等语言教学与文化交际主题。其中，“文化教学”突现强度最高，表明该阶段研究核心是“确立文化教学在国际汉语教育中的地位”早期研究多探讨“为何要开展文化教学”，引用 Kramersch（1993）理论论证“文化是语言习得的有机组成部分”；后期研究转向“如何初步开展文化教学”，提出“在对外汉语课堂中融入传统文化案例”的基本思路，对应 Byram 理论中 *savoir*（文化知识）的传递需求。

“跨文化”的突现反映学界对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初步关注，但强度较低（1.02），表明理论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研究多简单提及“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却未深入结合 Byram 理论的五大维度设计教学方案，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度不足。

2. 第二阶段（2018-2021 年）：技术融合与机制构建期

突现关键词包括“孔子学院”（1.63，2018-2019）、“一带一路”（1.52，2018-2020）、“人工智能”（0.89，2019-2022）、“专业学位”（2.02，2020-2021）、“教材”（1.7，2020-2021）、“在线教学”（1.13，2020-2021）。这一阶段的关键词拓展体现两大趋势：

一是“政策 - 实践联动”：“一带一路”的突现推动研究聚焦“政策导向下的文化教学优化”例如，探讨如何调整孔子学院的文化教学内容以适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求，这与 Byram 理论中 *savoir-transférer*（知识应用能力）的“情境适配”要求相契合；“专业学位”的高突现强度（2.02）则反映“文化教学人才培养机制”的构建研究围绕“国际汉语教育专业学位的文化课程体系”展开，明确课程需覆盖“跨文化交际理论”“传统文化解读”等模块，对应 Byram 理论对教师能力的要求。

二是“技术 - 教学融合”：“在线教学”与“人工智能”的突现，凸显疫情背景下远程教学模式的研究热度例如，设计“在线茶文化虚拟课堂”，利用视频互动功能模拟跨文化交际场景；尝试用 AI 分析学习者的文化知识掌握情况，提

供个性化学习建议。尽管二者突现强度不高（分别为 1.13、0.89），但标志教育信息化与智能化开始进入文化教学研究视野，为后续技术融合路径奠定基础。

3. 第三阶段（2021-2025 年）：国家话语建构与理论深化期

呈现“国家话语建构与理论深化”的发展趋势，突现关键词包括“国际传播”（1.37，2021-2025）、“中国故事”（1.13，2021-2022）、“学科建设”（1.64，2023-2025）、“跨文化适应”（0.91，2023-2025）。“国际传播”与“中国故事”的突现，反映文化教学从“能力培养”向“国家文化软实力输出”的延伸研究探讨如何通过“中国故事教学”培养学习者的中华文化认同，同时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这一方向既契合“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又拓展了 Byram 理论中“文化身份与国际责任”的内涵。

“学科建设”的高突现强度（1.64）表明文化教学开始关注自身学科体系构建研究围绕“文化教学的学科定位”“理论框架”“研究方法”展开，推动该领域从“依附于语言教学”向“独立学科方向”发展；“跨文化适应”的突现则提示研究聚焦“学习者的文化适应问题”，通过实证调查分析不同文化背景学习者的适应障碍，提出教学优化策略，这一实践深化了 Byram 理论中 savoir-être（开放态度）与 savoir-apprendre（文化学习能力）的研究，提升了理论应用的实证性。从突现强度与周期综合分析，“文化教学”（5.04）、“专业学位”（2.02）、“学科建设”（1.64）为核心突现关键词，分别代表“理念确立”“机制构建”“学科深化”三个阶段的核心议题；而“国际传播”“跨文化适应”等关键词延续至 2025 年，显示其研究生命力较强，有望成为未来该领域的持续性核心议题。未来研究应关注高强度关键词的理论深化，同时激发弱突现词（如“文化差异”“人工智能”）在知识网络中的中介功能，推动该领域形成更稳定、更具创新性的学术生态。

Top 20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图 6. 关键词突现图谱（2016-2025）

结论

基于中 2016-2025 年 CSSCI 及核心期刊“国际汉语教育中文化教学”相关文献的可视化计量分析,该研究系统呈现了该领域的发展轨迹、研究热点、知识结构与演进趋势。研究结果显示,文化教学在国际汉语教育体系中的定位发生关键转变,已从边缘性辅助内容逐步成为核心教学目标,尤其在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维度,其价值与重要性愈发突出;研究主题亦呈现显著转型态势,从早期聚焦传统文化传播,逐步拓展至国际传播战略适配、多学科融合及全球教育视野构建,直观反映出该领域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的持续深化。

同时,研究也揭示当前领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一是协作网络效能不足,作者与机构间协同关联度低,尚未形成高密度、高效率的研究共同体,制约学术资源整合与创新产出;二是研究深度与系统性欠缺,尽管“茶文化”“文化教学”等高频关键词凸显领域热点,但多数关键词中心性偏弱,导致研究议题呈现“广而不深”特征,理论框架尚未实现系统化建构;三是实践支撑体系不完善,面对“语言+文化”融合发展需求,文化教学在课程设置衔接、内容组织逻辑及评估体系标准化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在全球传播语境中的教学效能与战略价值。

针对上述挑战,结合文献数据与理论分析,研究提出未来发展路径:其一,重构教学范式,以“交际为导向、文化为中介”为核心,推动文化教学与语言习得、价值引导的协同互构;其二,搭建协作平台,通过组建跨学科、跨机构研究联盟,提升学术资源整合力与成果转化效率;其三,深化技术融合,引入 AI 语料分析、沉浸式虚拟教学等智能工具,拓展文化教学在内容表达、学习方式及评估机制上的创新路径。

综上,该研究从知识图谱视角清晰勾勒国际汉语教育中文化教学的研究脉络,有效填补了该领域宏观梳理的研究空白,为后续跨文化教学相关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方法参考与理论支撑,助力国际中文教育实现从“语言传播”向“文化共鸣”乃至“全球共识”的转型升级,服务于具有中国特色、全球视野的现代语言教育体系构建。

参考文献

- Anthony J. Liddicoat, A. S. (2013). *Intercultural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https://doi.org/10.1002/9781118482070>
- Baraldi, C. (2012).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interactions.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23(3), 211-226.
- Byram. (2021). *From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o Educ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itizenship*.
- Jung, J., & Wang, W. (2020).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and One Belt , One Road Initiatives on the Values of Cross-Border M & A :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 Juwono, H. (2024). Gelijkgesteld : The Change of Chinese Legal Status Under Indonesian Colonial Structure. 03(01), 62-75.
- Kramsch, C. (1993).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n, S. (2025).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14(February), 139-143.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2101>
- Sirui, M. (2018). Building the “chinese bridge”: dynamics of transnational engagement through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southeast asia.

- Xu, S., & Hu, Y. (2024). On Teaching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ssue Ichess). Atlantis Press SARL. <https://doi.org/10.2991/978-2-38476-323-8>
- Zhang, H., & Yao, C. (2021). Visualized Analysis on the Study of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Chinese Language. 551(Ermm), 555–558.
- 陈申. (2020). Kramersch 的后结构主义语言文化观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01), 34-42.
- 陈悦, 陈超美. (2015).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 [J]. 科学学研究, 33 (02), 168-175.
- 丁安琪. (2024). 《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价值、路径与策略 [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03), 89-98.
- 段鹏. (2022). 历时、共时及经验: 国际中文教育及传播应用研究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59 (04), 102-110.
- 段辉煌. (2020).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化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63–65. <https://doi.org/10.32629/mef.v3i3.739>
- 顾晓乐, 赵毓琴. (2021). 跨文化交际能力教与评的融合 (英文) [J].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 241-258.
- 李泉, 孙莹. (2023). 中国文化教学新思路: 内容当地化方法故事化 [J]. 语言文字应用, (01), 56-65.
- 孙有中. (2016). 外语教育与跨文化能力培养 [J]. 中国外语, 13 (03), 4-10.